清代理学

# 晚清汉宋调和论析

张昭军

［摘要］汉宋调和是晚清儒学值得注意的学术现象，其具体情况存有差异。即使同是调和论者，学术立场也有不同。就其大者而言，可分为宗宋学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学以及汉宋会通三种类型。这既体现了晚清传统学术的变化，也从一个侧面说明汉学、宋学之分派的相对性和局限性。

［关键词］汉学　宋学　调和　会通

［中图分类号］K2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8587（2006）－04－0036－08

**An Analysis of the Compromise between Han and Song Learning in the Late Qing**

The compromise between the Han Learning (the Confucian Classics) and the Song Learning (the Neo－Confucianism) was a noticeable academic phenomenon in Confucian development during the late Qing. This phenomenon was quite complicated and the degree of compromise between the two schools varied even among those who advocated convergence. Generally, one can distinguish three approaches: revering Song Learning while not abandoning Han Learning, revering Han Learning and accepting Song Learning, and synthesizing both. This situation reflected late Qing changes in traditional learning, and at the same time the relativity and limitation of demarcating these academic factions.

汉宋关系是清代学术的主线，也是清代理学史的重要方面。对此，学界已有一些成果①，但尚有研究余地。晚清时期，由于学术环境的变化，汉学、宋学势力的消长，汉宋调和成为儒学的主流趋向。“道咸以来儒者多知义理、考据二者不可偏废，于是兼综汉宋学者不乏其人。”②当时，主汉宋调和者人数众多，根据他们学术立场的不同，大体可分为三种类型，即宗宋学而不废汉学，宗汉学而兼采宋学，以及汉、宋学立场不明显的会通论者。

## 一、宗宋学而不废汉学

晚清时期，宗宋学而兼采汉学者，大多是程朱理学阵营中汉学成见较轻的人士。姚莹、曾国藩、刘蓉、夏炘、李元度等主张汉宋调和，主要从以下方面立论。

其一，追本溯源，以孔学化解汉宋之争，认为汉学、宋学皆传圣人之道。

宗宋学人士中主调和论者认为，汉学、宋学作为儒学内部的学术派别，二者同有功于孔孟之道，不存在根本性分歧。姚椿《汉宋儒者论》从“学必征诸圣人”出发，认为汉儒存圣人之言，宋儒“得圣人不传之遗意”，均有益于圣学：“由宋人之所已言，而复上推汉人之言，由汉人之言，而复折诸宋人之言，使其取也弗为蹈，而其弃也弗为隘，而又必以躬行心得为本。是圣明之学也。”③李元度明确提出，要以圣人之道折衷不同学术派别的门户成见：“是非有定者也，此是则彼非，无两可也。

［收稿日期］2006－4－30

［作者简介］张昭军（1970－），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北京 100875

抑有不尽然者，往往两是焉而并行不悖，甚则相反而适以相成。”“然则欲是非之不谬，非折衷圣人不可也。”④他认为，汉学、宋学不应当存此疆彼界，以圣人之道衡量，二者可两行其是。他在《四书广义序》中指出，汉儒专主训诂，宋儒专穷义理，皆明圣人之道，“为功于天下万世甚巨”⑤。李兆洛也不赞成汉、宋两家各张其帜、标榜门户的做法，认为二者各有所长，其大者皆有益圣道：“为考据之学者，援文比类，据物索象，迨其说不能自还，则务繁征博引，以蕲必伸，其蔽也凿。然而考订精勤之功不可没也。为义理之学者，穷理必从其朔，其蔽也或至于穷高极远而无所薄。然而剖析理欲、教人践履之功不可诬也。归之大要，皆有功于圣人。”⑥

姚莹、曾国藩、李元度、朱琦等还以汉学、宋学分别对应孔门的“文学之科”与“德行之科”，以此说明二者不可偏废。清代中期，戴震、姚鼐等主义理、考据、辞章三科之说，王鸣盛提出四科之说⑦。晚清时期，主调和论者重申此说，认为汉学、宋学皆圣人为学之途，反对存此废彼。曾国藩多次强调圣人为学之术有四，阙一不可：“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义理之学即宋史所谓道学也，在孔门为德行之科；词章之学在孔门为言语之科；经济之学在孔门为政事之科；考据之学即今世所谓汉学也，在孔门为文学之科。此四者阙一不可。”⑧李元度指出：“学术之途四：义理也，经济也，考证也，辞章也，是即三不朽之所从入也。”⑨朱琦则说：“学之为途有三：曰义理也，考订也，词章也，三者皆圣人之道也。”他还形象地把圣道比作京师，把汉学、宋学比作进入京师的东、西通途：“夫道犹京师也，学者所从入之途，或义理，或考订，犹途有东、西之分，其可以适于京师一也。”⑩朱一新也主张，“若汉学，若宋学，皆求道之资。”⑪

持调和论者还对汉学、宋学争道统的做法提出了修正，认为汉学、宋学代表前后相继的两个阶段。针对宋学所谓程、朱直接孔、孟道统之说，夏炘指出，宋代以前圣道未曾中绝，先后有大毛公、董仲舒、郑玄、诸葛亮、文中子、韩愈传继道统，并专门作《汉唐诸儒与闻录》为他们一一立传。夏炘的弟子白让卿也认为汉学、宋学道通为一：“世之袭汉学者动诋宋学为空疏，尊宋学者又以汉儒为佔毕，其实二者道同一贯，两不相妨。贾、董、郑、服不独淹通渊博，即其立品植行，亦称一代醇儒；宋之濂溪、伊洛、横渠诸大贤，直接道统，至我考亭朱夫子于书无所不读，阐扬圣功，发挥王道，更所谓集大成者。”⑫闽县陈濬偏重宋学，他在序夏炘《景紫堂全书》时也承认汉学有传道之功，称：“圣人之道，载于《六经》。遭秦火后，汉之诸儒掇拾煨烬，纂辑残缺，殚勤于文字训诂之间，虽微言大义，有未暇及，而使后儒得所考据以求圣人之意，功亦不细矣。有宋五子兴，席汉儒之业，因经求道，超然独契《太极》、《西铭》、《定性书》、《好学论》诸作，实能发前贤所未发。至朱子集群儒之大成，其于经训尤殚精研思，条分缕析，无不根极于理要，圣道由是大明。”⑬曾国藩继承了清代学者重视礼学的传统，提出以礼通汉、宋之结。其《圣哲画像记》为先贤铺叙道统，不立门户，汉宋兼收。在他看来，以礼为标准，汉儒、宋儒、清儒都是先王之道的传人，完全没有争立道统的必要。⑭

汉学、宋学虽有差异，但二者又都是儒学的表现形态，具有某种内在统一性。上述诸人虽以宋学为宗，但他们在调和汉宋争端时主张回归原始儒学，认为汉学、宋学同传道统，不能强分轩轾。这种调和方式应当说符合汉学、宋学实际。

其二，面向现实，承认汉学、宋学含有经世致用价值，二者相辅相成，有益世道人心。

每当汉宋角争，汉学家往往疾宋学为空疏，宋学家则讥汉学为支离。脱离现实，不切实用，成为相互指责对方的把柄。晚清特定的社会历史环境，使人们对学术的功用性更为重视。主调和论者认为，空疏支离乃汉、宋学末流之弊，宋儒讲明体达用，汉儒讲经世致用，都未曾背离圣人的内圣外王精神。他们从实用的层面阐述了汉宋调和思想，主张以宋学为宗，兼采汉学。

作为理学名臣，曾国藩肩负经邦济国与明正学术的双重任务，十分看重学术的经世功

能，曾多次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来阐述汉、宋关系。针对汉学家薄宋学为空疏，他指出："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苟通义理之学，而经济该乎其中矣。程、朱诸子遗书具在，曷尝舍末而言本、遗新民而专事明德?"[15]同样，他认为汉学也具有经世致用内涵："许、郑亦能深博"，"博则能究万物之情状，而不穷于用"[16]。

朱一新也从学术经世的角度来论述调和汉学的必要性。他说："学必期有用，功必归诸实践。由训诂进求义理，而如汉学家溺于训诂以害义理者，则不取；由义理探源性道，而如讲学家空衍性天以汩义理者，则不从。"[17]朱一新批评汉学、宋学末流的无实无用，反过来说明了汉学、宋学主流在实用实行上的一致性。

钱穆《汉学与宋学》一文指出，"汉学派的精神在通经致用，宋学派的精神在明体达用，两派学者均注重在'用'字。由经学上去求实用，去研究修齐治平的学问"，这是汉、宋两派学者之共同精神。[18]调和论者从学术的实用性出发，承认二者各有所长，反对是此非彼，偏执一端，有利于调息汉宋之争。

以上所述，不过是宗宋学者调和汉学的一面。需要指出的是，奉程朱理学为正宗是他们的一贯立场。他们兼采汉学，必须以程朱理学为取舍标准，是其所是，非其所非。他们肯定汉学中有利于程朱理学的部分，或视汉学为明正学术的一种手段，而对汉学家的义理学说则不予承认。

## 二、主汉学而兼采宋学

晚清时期，汉学持续衰落，宋学作为清政府的官方哲学，一度"复兴"。随着形势的变化，主汉学者对宋学的看法有所改变。其表现之一，即由清代中期以排斥宋学为主，转向调和。根据其尊汉采宋程度的差异，大体上可分为兼采、会通两种类型。

当时较为知名的学者如胡培翚、马瑞辰、刘宝楠、丁晏、郑珍、钟文烝、丁寿昌、李慈铭、张之洞等，汉学立场非常明确。在学术层面上，他们继承了乾嘉考据学传统，坚持"由训诂以明义理"和"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如张之洞主张，治经要以汉学为本，通经然后明道："汉学者何？汉人注经讲经之说是也。经是汉人所传，注是汉人创作，义有师承，语有根据，去古最近，多见古书，能识古字通古语，故必须以汉学为本而推阐之，乃能有合。以后诸儒传注，其义理精粹足以补正汉人者不少。要之，宋人皆熟读注疏之人，故能推阐发明。倘不知本源，即读宋儒书，亦不解也。"[19]他认为宋学须以汉学为根柢，方可明义理之奥义："性理之学，源出汉儒，强生分别，不知学者也。"他们主张在尊汉学的前提下，兼采宋学。

主汉学者调和宋学，与宗宋学者调和汉学的主张较为相近。他们的立论也多从维护圣人之道出发，以孔孟学说来调息汉、宋争端。

王筠博涉经史，尤长于《说文》，治学不依傍门户。他结合中国学术发展的历史分析汉儒、宋儒的学术特点，认为汉儒、宋儒各传所得，均有功于圣教："汉儒承焚书之后，搜讨于仪文度数甚详，此孔门博文之教，非象数无以载义理也。宋儒承汉学明备之后，从而推求其所以然，此孔门约礼之教，非义理无以宰象数也。使汉儒生宋时，亦必汲汲于义理；宋儒生汉时，亦必汲汲于象数。思心互为启牖，贤豪自立门户，其足以相成，而不足以相蔑也，彰彰明矣。"[20]他认为，汉儒传孔门博文之教，宋儒得孔门约礼之教，互为启牖，足以相成，不应厚此薄彼。

冯桂芬治经宗汉儒，亦不废宋。他在为曲阜孔宪彝书房作记时说：于汉于宋"学者宜何从？曰：吾从圣"。"考据本于圣，吾不敢訾汉儒也"，"义理本于圣，吾不敢訾宋儒也。且汉儒何尝讳言义理，宋儒何尝尽改汉儒考据，汉儒、宋儒皆圣人之徒也。汉古而宋今，汉难而宋易。毋蔑乎古毋薄乎今，毋畏乎难毋忽乎易，则学者之为之也，用圣人四科四教之法取之，兼收并蓄，不调而调，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21]林昌彝"通汉、宋之学"，其《汉宋学术论》称："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讲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如日之中天，未可偏激而互诮也。学者得其分合之道，则汉学、宋学，一以贯之，而何门户之别哉！"[22]黄爵滋《汉宋学术定论论》也以

调和汉、宋为宗旨："汉、宋学者，皆孔氏之徒"，"无汉儒之训诂，则宋儒之性道无由而发；无宋儒之性道，则汉儒之训诂无由而归。是汉儒孔氏之功臣，而宋儒又汉儒之功臣也"[23]。劳乃宣长于汉学，不弃宋学，力主调和之说，认为汉学、宋学"皆所以学圣人之道，本不必过自分畛域也"[24]。

张之洞"为学忌分门户"，他在调和汉宋之争时折衷于圣人之道："近代学人大率两途，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逐末忘源，遂相诟病，大为恶习。夫圣人之道，读书治心，谊无偏废，理取相资。"[25]他出身汉学，但不为汉学所囿，认为那些宗汉废宋者违背了圣人设教授学的旨意："先王设教，孔门授学，自当本末兼赅，道器并著，岂有但详学童仪节之文、五礼名物之制，而于身心治道绝不容一语及之者。"[26]宋学宗朱熹，汉学尊郑玄，张之洞指出，无论汉、宋，治经要以《论语》、《孟子》为准绳："窃惟诸经之义其有迂曲难通、纷歧莫定者，当以《论语》、《孟子》折衷之，《论》、《孟》文约意显，又群经之权衡矣。"[27]

在晚清学术融合的背景下，一些主汉学者折衷汉、宋，还提出汉儒亦讲义理、宋儒不废训诂的观点。胡培翚说："人之言曰：'汉学详于训诂名物，宋学详于义理'，以是歧汉、宋而二之，非也。汉之儒者，未尝不讲义理；宋之儒者，未尝不讲训诂名物，义理即从训诂名物而出者也。"[28]郑珍说："程、朱未尝不精许、郑之学，许、郑亦未尝不明程、朱之理，奈何歧视为殊途？偏执之害，后学当深戒。"[29]林伯桐作《朱子不废古训说》，称赞朱熹"能考证古训，折衷一是，不以空言说经，可谓不从流俗"，并指出其《四书章句集注》之名本自汉儒[30]。张之洞坦称："愚性恶闻人诋宋学，亦恶闻人诋汉学。意谓好学者即是佳士，无论真汉学未尝不穷理，真宋学亦未尝不读书。"[31]黎庶昌早年师从莫友芝、郑珍研习汉学，但不排斥宋学，认为子夏、郑玄、朱熹由考据而明义理，"以缵斯文于未丧"："世儒耳食目语，不究朱子研经宗汉之旨，而概以道学附之，不识康成整齐六艺之功，而反以训诂少之，皆非博笃至论也。若子夏氏之发明，则更数典忘而易忘矣。《六经》之义坦然明白，今日而如日正中，悬诸不刊之典矣。讵知夫天皆纵此三大儒者出其绝地通天之力，以缵斯文于未丧。"[32]他后来师事曾国藩学习桐城古文，宗宋而不废汉，又从另一个方面体现了汉宋调合的时代特点。

经世致用是儒家各派共同遵循的思想主张，汉学、宋学在维护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伦理道德方面并不存在根本分歧。宗汉学者在调和汉宋之争时认识到了这一点，并有发挥。陈庆镛"精研汉学，而服膺宋儒"，认为汉学、宋学在实用性方面是统一的："汉、宋之学，其要皆主于明经致用，其归皆务于希圣希贤。他人视为二，吾直见为一也。"[33]罗汝怀偏重汉学，却"疾近世汉学、宋学之分，以为名物度数，先王所以立教，而学先识其大，诚未可偏胜。故其学于六艺故训、地理沿革、古今水道源流分合、历代法制氏族、金石篆隶，靡不研诵而一本于立身行己"。[34]他将汉学的通经致用与宋学的立身修己结合在一起，体现了二者的致用之长。张之洞认为，好读书者宗汉学，讲治心者宗宋学，皆有益于世道人心："学以躬行实践为主，汉、宋两门皆期于有品有用"。[35]他还就读书、明理与致用的关系作了说明："近人往往以读书明理判为两事，通经致用视为迂谈……随时读书，随时穷理，心地清明，人品自然正直，从此贯通古今，推求人事，果能平日讲求，无论才识长短，筮仕登朝，大小必有实用。"[36]他在回答诸生的提问时指出，汉学、宋学各有其用，"汉学，学也；宋学，亦学也；经济、词章以下，皆学也。不必嗜甘而忘辛也。大要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汉学岂无所失，然宗之则空疏蔑古之弊除矣。宋学非无所病，然宗之则可以寡过矣。"[37]

晚清时期，多数尊汉学者在思想主张上虽赞成调和宋学，但因受汉学立场所囿，他们的行与言往往有较大出入，汉宋兼采只能在一定限度上付诸实施。

主汉学者所采择的宋学，在学术方面主要是宋儒尤其是朱熹的注疏成就。李慈铭指出："至谓宋儒解经亦尽有是处，尤见持平折衷。鄙人尝细读《诗》之欧《本义》、朱《集传》，《书》之苏《传》、蔡《传》，其议论亦

间有较胜汉儒者。而国朝惠氏栋之《易》，王氏鸣盛、孙氏星衍、江氏声之《书》，专述郑义，字字抉剔，亦不免自相违反。盖康成总结诸义，博观会通，千虑一失，岂能毕照？《书注》既亡，出于掇拾，更不能无所羼乱，使郑君生于今世，必不竟弃宋儒如惠氏、王氏、江氏之专也。至程子之《易》，朱子之《易》与《礼》，尤与汉儒相辅不北。惟宋儒之患，在不善学者尽弃训诂名物，以孟浪行之，而谓《易》可无象，《诗》、《书》可无序，则一切古书俱可不读矣。"[38]晚清汉学由于扩大了取证范围，吸收了宋学的一些学术成就，故在乾嘉汉学基础上能够更进一步。当时汉学的重要成果，诸如胡培翚《仪礼正义》、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刘宝楠《论语正义》、丁晏《周易述传》、丁寿昌《读〈易〉会通》、郑珍《仪礼私笺》、钟文烝《穀梁补注》，以汉学为主不废宋学，融汉学之博洽与宋儒之精密为一体，较好地体现了兼综汉宋的时代特色。[39]

在治身方面，晚清汉学家吸取了宋学躬行实践的特点。清代汉学兴起之初，就有人汉、宋兼综并行，读书宗汉学，修身宗宋学。如元和惠士奇即以"《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为楹联。晚清时期，部分学者为救汉学末流支离破碎之弊，积极吸收宋学长于治身心的特点。陈庆镛自谓："《六经》宗许、郑，百行法程、朱，亭林之言，吾辈当以自励。"[40]李慈铭"勤于考订，兼尊宋学，谓可以治身心"[41]。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以师生问答的形式就汉宋关系作了阐释，认为"宋学贵躬行，不贵虚谈"可以祛除汉学空疏蔑古之弊，并主张"读书宗汉学，制行宗宋学"。他在《輶轩语》中对朱熹学说大为赞赏，称："朱子《近思录》一书，言约而达，理深而切，有益身心，高下咸宜，所宜人置一编。"[42]

## 三、汉宋会通

汉宋会通论者以兼综折中、融会贯通为特色，不偏主一家。晚清时期，标榜会通成为学术时尚，当时汉学、宋学人士中不少人具有这种倾向。但能将这种思想主张与具体治学实践结合在一起者，实则较为少见。其中，陈澧及黄式三、黄以周父子虽出身汉学，但后来注重采纳宋学之长，门派成见不像前述诸人那么明显，学界多以汉宋会通论者视之。

陈澧曾自述治学历程说："余少时志欲为文章之士，稍长为近儒训诂考据之学，三十以后，读宋儒书，因进而求之《论语》、《孟子》及汉儒之书。"[43]陈澧会通汉宋的代表性著作，"其精者为《汉儒通义》，其博者为《学思录》(后定名为《东塾读书记》)"[44]。

《汉儒通义》汉宋会通色彩明显。该书综合《白虎通》、《近思录》等书体例，"专采经说，《白虎通》之例也，题某家之说，《近思录》之例也"[45]。陈澧在论述此书的宗旨时说："汉儒说经，释训诂，明义理，无所偏尚。宋儒讥汉儒讲训诂而不及义理，非也。近儒尊崇汉学，发明训诂，可谓盛矣。澧以为汉儒义理之说醇实精博，盖圣贤之微言大义往往而在，不可忽也……窃冀后之君子，祛门户之偏见，诵先儒之遗言，有益于身，有用于世，是区区之志也。若门户之见不除，或因此而辩同异、争胜负，则非澧所敢知矣。"此书虽以汉儒为研究对象，但不偏于考据、义理之一端。他表彰汉儒，意在纠偏除弊，会通汉宋，以此回应宗宋学者菲薄汉儒不讲义理之说，矫正清代汉学家专事考据弃置义理之弊。需要指出的是，该书所说的义理与宋儒的义理学说相互贯通，"以为汉儒之书固有宋儒之理"[46]，而非清儒戴震等反理学者所讲的"义理"。

《东塾读书记》"详于朱子之学，大旨在不分汉、宋门户"[47]，以会通汉宋著称。这从其两是郑、朱可见一斑。汉学尊郑玄，宋学尊朱熹。持汉宋门户之见者往往是此则非彼，宗汉学者斥朱熹不事考据，宗宋学者诋郑玄不讲义理。该书卷十三《郑学》对肯定郑玄者加以褒扬，对批评郑玄者加以驳斥。他认为，郑学包含有义理之学，乃汉学、宋学的统一。宋学家攻击郑玄不讲义理之学，清代汉学家以郑玄惟事考据，均不得要领。在陈澧看来，朱熹也是一位博通汉、宋学的人物。该书卷十五《朱子书》反复申述的主题即朱熹一贯注重训诂传统，教人读汉人注疏，"而深讥不读注疏者"。他将后人所说朱熹反汉儒的言论一一枚

举，然后加以辩驳，力图说明朱学源于郑学，朱、郑只有形式上的差异而无本质上的不同。他指出："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其持论不偏如此。盖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48]为表彰郑、朱，陈澧还与人辑刊有《郑氏遗书》、《朱子语类日钞》。

陈澧《东塾读书记》的会通汉宋，并不是汉学方法与宋学义理的简单结合，而是通过具体的学术实践，以考据为基础，来论说汉学的微言大义与宋儒的义理学说的一致性："汉儒之书，有微言大义，而世人不知也。唐疏亦颇有之，世人更不知也。真所谓微言绝、大义乖矣。宋儒所说，皆近于微言大义，而又或无所考据，但自谓不传之学。夫得不传，既无考据耳，无师承耳。国初儒者，救明儒之病。中叶以来，拾汉儒之遗，于微言大义，未有明之者也。故予作《学思录》，求微言大义于汉儒、宋儒，必有考据，庶几可示后世耳。"[49]他不仅两是汉、宋，承认二者都讲义理、考证，而且还论证了汉学义理与宋学义理的内在一致性，从学理上实现汉、宋学义理的会通。例如，陈澧的礼经研究就贯穿了汉宋会通的思想。一方面，他在研究中注意吸收汉儒、宋儒治礼成果，汉宋兼采，以此增强论证的效果。另一方面，他借礼学破除汉、宋门户之见，会通汉学与宋学。[50]

《清儒学案》称：陈澧"兼以郑君、朱子为宗主，通汉宋之邮，意在补偏救弊，不为无益无用之学，其宗旨特为醇正"[51]。胡锡燕说：陈澧治学"实事求是，不取门户争胜之说"[52]。《东塾读书记》对晚清汉宋调和学风产生了一定影响，有人甚至认为，"沟通汉宋，一时学风为之丕变"[53]。

黄式三、黄以周父子会通汉宋，主要体现在礼经研治方面。黄式三著有礼说三篇。其《复礼说》以礼为圣人制作，对礼学备加推崇："礼也者，制之圣人，而秩之自天……孔圣言'克己复礼为仁'。复礼者，为仁之实功也，尽性之实功也。"[54]《崇礼说》则提出，崇礼为致中和的最佳途径，有助于避免学术偏失。[55]据此，在对待汉学与宋学关系时，黄式三主张以礼为会通二者的要道。其《约礼说》对凌廷堪"以礼代理"说提出了批评："凌次仲教授《礼经释例》首以《复礼》上、中、下，其下篇云：'仁不能舍礼但求诸理'；又云：'求诸理，必至于师心'；又云：'圣学礼也，不云理也'。此因儒者舍礼言理，指心之微而难见者，以为幽妙，有激而言，矫枉过正。"[56]他认为，凌氏所谓的圣学不言理之说不能成立："古之所谓理者，何邪？《礼器》曰：'义理，礼之文也。'《乐记》曰：'礼也者，理之不可易者也。'然则礼之三百三千，先王所条分缕析，灿然显著，别仁义，明是非，君子所不敢紊而畔之者，此理也。"[57]"理"蕴蓄于圣人之"礼"当中，藉"礼"而存在。黄式三所讲的"理"虽与朱子所讲的"理"有出入，但却在"礼"与"理"之间架起了桥梁。他以说礼三篇为基础，提出"礼者，理也。古之所谓穷理者，即治礼之学也。尽性在此，定命在此"[58]，从而实现了汉学与宋学的调和、会通。

黄以周承继其父式三的礼学思想而有所发展，提出"礼学即理学"之说以融贯汉学与宋学。他同样予礼以很高的评价："古人言学，近之以治其身心，远之以治其国家，不越乎礼。礼也者，诚正之极则，治平之要道也。"[59]以此为基础，他借助于顾炎武提出的"经学即理学"思想，在礼学与理学之间建立了联系："经以载道，经学即是理学，经学外之理学为禅学，读《日知录》可会之。考据间有未明，义理因之而晦。"[60]经学即理学，礼学为经学亦即理学也，考据明则义理明。以此，黄式三打通了"考礼"与"穷理"的关节："圣门之学者，重约礼。礼者，理也……古人论学，详言礼而略言理，礼即天理之秩然者也……故考礼之学，即穷理之学也。"[61]顾炎武"经学即理学"主要是针对明末理学空疏而发，黄以周"以礼学为理学"则在救汉、宋学之弊。其《经训比义》称："博文约礼，圣门正训。学者欲求孔圣之微言大义，必先通经。经义难明，必求诸训诂声音，而后古人之语言文字乃憭然于心目。不博文，能治经乎？既治经矣，当约之以礼。""礼者，理也，天理之秩然者也。考礼即穷理。后儒舍礼而言理，礼必实征往古，理可空谈任臆也？欲挽

汉、宋学之流弊，其惟礼学乎！”[62]黄以周既反对汉学家考据训诂脱离义理之弊，又反对理学家空谈天理性命缺乏征实之弊。他提出“以礼学为理学”，就是要倡导以礼学研究融会汉学与宋学。其《礼书通故》、《礼说略》、《子思子辑解》汉宋兼采，实事求是，为清代礼学研究的精赡之作，体现了他会通考证与义理的学术思想。

顺便指出，清代中叶，戴震深斥宋学家所言之“理”，凌廷堪乃易之以言礼，“同时学者里堂（焦循）、芸台（阮元）以下，皆承其说，一若以理、礼之别，为汉、宋之鸿沟焉”[63]。一些汉学家厉禁穷理，第以礼为教，“理”、“礼”之别由此而成为汉、宋争讼的话题之一。晚清时期，恢复和维护封建礼义秩序是与挽救封建统治危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与此相应，礼学研究也受到了士大夫的重视。以礼学来息汉宋之争、通汉宋之邮并不是个别人的主张，也不是仅属于汉学一派，而是一种较为普遍的学术文化现象。除上已提及者外，夏炘著《学礼管释》，胡培翚著《仪礼正义》，郑珍著《仪礼私笺》，郭嵩焘著《礼记质疑》、《大学质疑》、《中庸质疑》等，均以汉宋兼采为宗旨，从而在整体上体现出晚清礼学研究调和、会通汉宋的时代特点。

---

① 较具代表性的文章有叶梦雨《清儒汉宋之争訾议》（《真知学报》第3卷第3、4期）、贺岳僧《清代汉宋之争》（《时代精神》第8卷第3期）、张君劢《中国学术史上的汉宋两派之长短得失》（收入《张菊生先生七十周年纪念文集》）、周予同《汉学与宋学》（收入《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龚书铎《道光间文化述论》（收入《中国近代文化探索》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何佑森《清代汉宋之争平议》（《文史哲学报》第27期）、魏永生《清中晚期汉宋学关系研究》（北京师范大学1999年博士学位论文）等。

② 徐世昌：《心巢学案》，《清儒学案》卷一百八十，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③ 姚椿：《汉宋儒者论》，《晚学斋文录》卷一，道光年间刻本。

④ 李元度：《是非》，《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八，光绪六年爽溪精舍刻本。

⑤ 李元度：《四书广义序》，《天岳山馆文钞》卷二十六。

⑥ 赵振祚：《养一斋文集·序》，见李兆洛：《养一斋文集》卷首，光绪戊寅重刊本。

⑦ 王鸣盛：《王戆愚先生文集序》，《西庄居士始存稿》卷二十五，乾隆年间刻本。

⑧ 曾国藩：《问学》，《曾文正公全集·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光绪年间传忠书局刻本。

⑨ 李元度：《送黄奎垣训道常德序》，《天岳山馆文钞》卷三十一。

⑩ 朱琦：《辨学上》、《辨学中》，《怡志堂集》卷一，同治三年刊本。

⑪朱一新：《无邪堂答问·序》，中华书局2000年版。

⑫白让卿：《述朱质疑·后跋》，见夏炘：《述朱质疑》卷末，《景紫堂全书》，民国十年刻本。

⑬陈澹：《序》，见夏炘：《景紫堂全书》卷首。

⑭可参见张昭军：《曾国藩理学思想探析》，《北京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2期。

⑮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文集·诗文》，443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⑯曾国藩：《复夏弢甫》，《曾国藩全集·书信》（二），1576页，岳麓书社1989年版。

⑰朱一新：《答龚菊田刺史书》，《佩弦斋文存》卷下，光绪二十二年葆真堂刻本。

⑱钱穆讲，刘大洲记：《汉学与宋学》，《磐石杂志》第2卷第7期，1934年出版。

⑲㉕㉛㉟㊱㊷张之洞：《輶轩语》，《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零四，中国书店1990年影印本。

⑳王筠：《问经堂序》，《清诒堂文集》，112～113页，齐鲁书社1987年版。

㉑冯桂芬：《阙里致经堂记》，《显志堂稿》卷三，光绪二年校邠庐刊本。

㉒林昌彝：《汉宋学术论》，《林昌彝诗文集》，24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

㉓黄爵滋：《汉宋学术定论论》，《仙屏书屋文录》，《中国近代文学大系·散文集》（一），413～414页，上海书店1991年版。

㉔劳乃宣：《孔子编年朱子年谱安先生年谱合刻序（代）》，《桐乡劳先生遗稿》卷二，桐乡卢氏刊本。

㉖张之洞：《读经札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一。

㉗张之洞：《宗经》，《劝学篇》，18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版。

㉘胡培翚：《答赵生炳文论汉学宋学书》，《研六室文钞》卷五，光绪四年世泽楼刊本。

㉙陈田：《黔诗纪略后编郑征君传》，见郑珍：《巢经巢文集》卷首，民国二十九年贵州省政府印本。

㉚林伯桐：《朱子不废古训说》，《修志堂稿》卷二，道光二十四年刊本。
㉜黎庶昌：《图画章句三大儒遗像记》，《拙尊园丛稿》卷二，光绪十九年上海醉六堂石印本。
㉝何秋涛：《〈籀经堂类稿〉序》，见陈庆镛：《籀经堂类稿》卷首，光绪九年刊本。
㉞郭嵩焘：《皇清诰封诵议大夫太常寺卿衔候选内阁中书选受芷江龙山县儒学训导罗君墓志铭》，见罗汝怀：《绿漪草堂文集》卷首，光绪九年湖南省城刻本。
㊲张之洞：《创建尊经书院记》，《张文襄公全集》卷二百十三。
㊳李慈铭：《复桂浩亭书》，《越缦堂文集》，124页，文海出版社1974年版。
㊴胡培翚继承祖父胡匡衷治学不分汉宋门户的风格，所著《仪礼正义》40卷宗郑注而兼采宋学。马瑞辰著《毛诗传笺通释》承家学之风，汉宋合流。刘宝楠著《论语正义》24卷（后7卷由其子刘恭冕续成），病梁皇侃《论语义疏》、宋邢昺《论语注疏解经》之芜陋，仿焦循《孟子正义》，以何晏《论语集解》为主，搜辑汉儒旧说，益以宋人注释，并吸收清代诸家之成果而成。丁晏前期宗奉郑玄，专尚考据训诂，道光末年转向汉宋兼采，他在《读经说》中说："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定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统之曰经学而已。"他于咸丰年间所成的《周易述传》、《左传杜解集正》等著作汉宋兼采，其《左传杜解集正》自叙："自汉宋之学分，党同伐异，经学与理学歧而二之，非通儒之学也。"其子丁寿昌于同治元年所著《读〈易〉会通》，亦会通汉宋。郑珍所著《仪礼私笺》8卷，贯通郑、朱之注，纠正了清儒在《仪礼》研究中的不少讹误。黎庶昌《郑征君墓表》称："其初实致力于许、郑二家之书，以为不明传注则经不能通，不明训诂则传注不可得而读，其于康成、叔重信之惟恐不笃，尊宠之惟恐不及。既治三反，苟有惑则发愤谭思，又不合则群综诸儒之说，旁参曲证，必求一得当程、朱之义理而已。"钟文烝著《穀梁补注》24卷主汉宋兼采，该书《略例》说："凡补注之作，以征引该贯，学郑君三礼注；以探索精密，学朱子《四书章句集注》。"
㊵徐世昌：《春海学案》，《清儒学案》卷一百四十六。
㊶徐世昌：《越缦学案》，《清儒学案》卷一百八十五。
㊸㊹陈受颐编：《陈兰甫先生澧遗稿》，载《岭南学报》第2卷第2期。
㊺陈澧：《汉儒通义·条例》，番禺陈氏东塾丛书本。
㊻㊾胡锡燕：《汉儒通义·跋》，《汉儒通义》卷末。
㊼陈澧：《复刘叔俛书》，《东塾集》卷四，光绪十八年菊坡精舍刻本。
㊽陈澧：《东塾读书记》，311～312页，三联书店1998年版。
㊾杨寿昌编：《陈兰甫先生澧遗稿》，载《岭南学报》第2卷第3期。
㊿陈澧：《东塾读书记》，172页。
51徐世昌：《东塾学案》（上），《清儒学案》卷一百七十四。
53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155页，岳麓书社1998年版。
54黄式三：《复礼说》，《儆居集》经说一，见《定海黄氏遗书》，北京师范大学藏同治光绪年间刻本（下同）。
55黄式三：《崇礼说》，《儆居集》经说一。
56 57黄式三：《约礼说》，《儆居集》经说一。
58黄家岱：《礼记笺正叙》，《嬹艺轩杂著》卷下。（此字左右结构，左为"女"，右为"兴"的繁体字）
59黄以周：《答周官问》，《儆季杂著》文钞四。
60黄以周：《南菁书院立主议》，《儆季杂著》文钞六。
61黄以周：《曾子论礼说》，《儆季杂著》文钞一。
62见缪荃孙：《中书衔处州府学教授黄先生墓志铭》，《续碑传集》卷七十五，《清代碑传记全集》下册，119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
63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547页，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